



汤吉夫短篇小说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汤吉夫短篇小说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汤吉夫短篇小说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7 7/8印张 3插页 162,000字 印数：1—21,700 1982年12月第1版
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46 定价：0.67元

目 录

1	同志
19	房
30	老涩外传
48	隔代人
62	“女光棍”轶事
82	心
98	忌烟
116	希望
139	遗嘱
155	雨巷
170	蒙面女
186	雪夜静悄悄
203	逃
220	母亲
233	眼镜王

同 志

一

“腊七腊八，冻掉脚丫。”腊八这天西北风嗷嗷叫了一天，卷着砂粒的寒风打到脸上，真象刀子刺的那么疼。

我的心绪不佳——报上那些连篇累牍的文章又在批“老家伙”们了——便跑到城里的小饭馆里，要了四两白干，一个人无聊而郁闷地喝起来。我酒量本不大，两口酒下肚便觉得手脚麻酥酥，脑袋也发胀。积郁在心底的闷气，也随着酒气的散发升腾起来，弥漫在心头。

棉门帘撩开，风沙裹着一个人进屋来。这是一个既高且瘦的青年人，穿着一件长没膝盖的短大衣。他把挎包往我的桌子上一放，就连忙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上的水汽，然后使劲地搓着两只冻得发僵了的通红的手。他买了两个烧饼，一碟菜，坐到我的对面，头也不抬地吃起来。他并不怎么年青，脸上没有小伙子常有的青春的光泽，眼角处隐隐地刻下了鱼尾纹。大约是三十出头的年纪。

“冷吗？”我问。

他没有听见，只是吃。我又问了一句，他似乎仍然没有听见。过了半天才蓦地抬起头，用那双惊疑的眸子盯着我问：“是和我说话吗？”

“嗯，你一定很冷。”

他点点头，用细长的手指指指耳朵道：“连耳朵都快冻掉了。”这时，我才注意到他没有戴帽子，蒙着一层尘土的头发，支支楞楞地扎煞着。

“喝口酒就暖和了。”我把手中的酒盅递过去。

他看了看我，没有吱声，接过酒盅，端详了一阵，便猛地喝了一大口，然后就呲牙咧嘴地摇头，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咳嗽。

“喝酒不能这么猛！”我站起身把酒盅从他手中接过来，一边问：“你是本县的？”

“灵丘公社中学的。”

灵丘离城三十里，这么个大风天进城来，多不凑巧。看他那满脸满头满身的尘土，一定是在大风中赶了很长时间的

路。

“进城有急事？”

“唔，”他摇摇头道，“说急也不急，说不急也真急死人。”

“你是当老师的？”

“嗯，”他点着头，“教体育的，说是我会打篮球，就让我教体育。”说着，他自己也苦笑起来：“会打篮球就得教体育，多有意思。”

我把残余的一点酒喝下去，问他：“那么，你不愿教体育喽？”

他放下手里的烧饼，张惶地眨着眼睛反问道：“我不是说教体育不重要，可我哪儿会教呢？上大学时，因为我个子高，一有比赛大家就拉扯着我上去打后卫。这就是全部的资本，教体育我不称职，不够格呀！另一方面，我在大学学的是农机制造，学而不能用于，这多令人遗憾！”

如果这情况属实，也真是够令人遗憾的了。这件事，我早有耳闻。他们分配工作那年，我还在文教局反省，听说有那么一个上海青年是学农机制造的，一定要求到农机厂去，结果惹火了新上任的曹局长，把他当成典型整了一通，才分配到灵丘那个偏远的公社去了。

“是上海人？”为了印证记忆中的这件事，我问。

“嗯，大学是在北京上的。”

“这回一定是闹调动来的。”

他又苦笑了，凄楚地缓缓地点着头：“没有希望，曹局长根本就不见我。我找他不下十回啦，给我扣了一摞帽子，我倒也不在乎。现在是连面也不肯见了。”

曹局长？我心想这小伙子也真不走运，偏偏要找这位丧门星。说实在话，一想起这位局长的柿饼子脸，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。他那些高论，真会让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啼笑皆非。他推行开门办学，一声令下，全县各校的老师都不许进教室，就是把黑板挂在大树上，照在教室里一样地讲，也得搬出来上课。而且还有一条“法律”，三次不照局长的指示办就要把教室拆掉。这并非只是一种威胁，他真的下令拆过一个学校的教室。他说他是信仰法家的，商鞅就是“斩木为信”才树立起威信来，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他还公开宣布：

教师中凡是两口子在一个学校教书的，一律调离二十里，否则两口子在一起要“耽误工作”。而他的老婆不仅从乡下搬进城里，还从社员转成干部。可不能小瞧这位七二年突击入党的局长，在县里上下左右他都维持得不错，有了电影票、戏票，他知道该往哪个机关多送几张，有了转正指标，他懂得先把头头脑脑的亲属子女安排了，至于保送上大学，哪个先走，哪个后走，他笑眯眯地早都盘算好了。一清二楚，绝不会出差错的。

“你应当找上头。”

“找过，去年我给省里写信，信转回县里。曹局长大发雷霆，说我上告是诬蔑他，是诽谤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班子，把我整了一个星期。大伙都说，县官不如现管，反正你迈不过他那道门槛去，还是想想办法疏通一下，找个熟人说说话。可我哪来的熟人？人生地不熟，唔，你知道……”

青年人实实在在的话勾得我也心潮翻滚。和曹局长那些人有什么理可讲？想起十几年间和他的交往，心胸里的愤慨便无法平息下去。

“这么着，我替你去找县委。”

他惊讶了。镜片后边那一双惊愕的眼睛，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我。

“找县委？你……”

“是啊，应当找县委。”

“唔……你贵姓？”

“姓崔，叫崔征。”

他注视着我胸前的校徽，眼睛突然亮起来，脸上的肉也

隐隐地抽搐起来：“是县中的崔校长吗？”

“是，老走资派啦。”

“哎呀，”他不管我是不是走资派，站起身来向我伸出手说：“你以前是老局长，局里人一定熟，你到局里去替我说说吧，不用去找县委。我想，他们会看你的面子的。”

嘿嘿，他毕竟是青年人。“他们会看你的面子的。”谈何容易！我难道不是从文教局的院子里赶出来的吗？曹局长从工代会一进文教局，不但把我赶跑，连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也调得七零八落，我哪有什么熟人？曹局长本是局里的会计，应当说是熟人，可人家是响当当的“左派”，而我呢？早就被封定“犯了走资派错误”，走资派去找“左派”讲情，“左派”还会给面子，这不太天真了？但是在火一般炙热的目光催逼下，我怎能拒绝他呢？于是我说：“试试看吧，不一定能行。”

也许是他碰过的钉子太多了，即使是这样毫无把握的回答，也使得他一下子兴奋起来。两只眼睛闪着光芒，嘴里一个劲地咕囔：“啊，我太高兴了，多巧，碰上了你，唔，碰上了你。”

“不过，你千万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”

当他撩开门帘猫腰走出饭馆的时候，还曾回过头来笑着向我挥手。一霎间，我忽然觉得他不象三十出头的人了，倒象是个十七、八岁的天真烂漫的孩子。

二

时间匆匆地流逝着，不久就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了。其间，他曾写给我三封信，一封比一封恳切，他把希望完完全全寄托在我的情面上了。

一月九日，这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极度悲痛的日子。大地、江河、山岳、海洋、人民都在哭泣。天空飘着雪，雪片子扶摇扶摇地落着，听到广播里再一次播送讣告，我也又一次地从办公室里出来，面朝着北京的方向，低垂着头，在雪花中默然地向我们敬爱的总理致哀。悲壮的《国际歌》声结束了，四周一片沉寂，连雪花也象懂得人的心情，悄悄地、无声地飘落着。我轻轻弹掉腮边的泪水，挪步往房间里走来。突然，我看见我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清瘦的青年人，高个子，满脸泪痕，低垂着头，恭恭敬敬地站在雪地里。

“你？”

“崔校长——”他几乎是哭着喊道：“我太难过了，你知道，唔，你知道总理他老人家没来得及看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，就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，放声地呜咽起来。他的呜咽那样地富于传染性，我的眼睛里，不自觉地也涌出了泪水。

进了屋里，他还是一个劲地抽泣，也不顾擦泪，任泪水往下滴落。

“化悲痛为力量吧。”我强忍住悲痛，劝他道。

他两只手捂着脸，简直是号陶大哭起来，泪水从他那细长的手指缝里流出来。“他一天只睡几个小时的觉啊，为人民

他操碎了心，这样的人怎么能死去呢？他没来得及看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啊！……”

“我们去努力吧！”我走近他，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，安慰着。

“唔，你知道，”他突然地两只手把我的手握住，拉至他的胸口上说：“我心里有把火啊，憋在里边的啊！为什么不能放它出来痛痛快快地燃烧呢？”他睁着一双眼睛，使劲地握住我的手，大声地问着：“你说啊！你回答我啊！”

我心里难受极了，这些话不同样积郁在我的心底吗？我向谁去呼喊呢？

“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同志。我明白你的心。”

他愣愣地盯住我的眼睛，泪珠儿成串地滚下来，嘴里喃喃地说道：“‘同志’，‘同志’，‘同志’，”然后，他猛地走近我，重新抓住我的手，使劲地上下摇动着：“几年了，就是你肯跟我叫一声‘同志’，唔……”他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：“同志，在这样的时刻，你知道，我多想能立刻站到自己的岗位上，把劲全部都使出来，那样，我心里也许会舒坦一点。”

内心里积着一团火，恨不得立时冲出来的急迫心情，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。我考虑了一阵，决定去冒冒险，于是我对他说：“你先坐一会儿，我现在就去文教局替你说说看。”

我到文教局去了。大雪天里，曹局长的屋子里倒挺暖和。炉子上水壶口咝咝地响，热气直往人脸上扑。只穿着毛衣的曹局长正和另外三个人凑在一张矮桌子上摔老K。热茶散着香气，烟蒂扔了一地。屋外边正在响着的哀乐仿佛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事，我的肺简直都快炸了。

“老崔，”曹局长瞥了我一眼，马上又瞅他的牌去了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呵呵……”柿饼子脸上堆满了笑，一边把手中的一张纸牌啪地扔下去，大声嚷着：“毙了！毙了！”

窗外，哀乐低沉而缓慢地传来。

“我有件事想和你单独谈谈。”

“噢，是吗？毙了！毙啊！呵呵呵呵，痛快！痛快！”

哀乐缓慢而低沉地响着。

三个打牌人知趣地走了。我便说道：“灵丘社中有位老师，是学农机制造的……”

不料我一张口，曹局长便搂着肚子笑道：“不错，有这么个孙天宝，上海人，一个地地道道的‘精神病’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呵呵，起码是个书呆子。跑到乡下来，连对象都不要了；呵呵……”他喝了一口清香的茉莉茶，仰靠在沙发上说：“他那个对象长得还满俏呢！穿着也挺港，我见过，孙天宝报到来的时候，那女的来送过，真正的上海小姐嘛！后来不知怎么岔劈了，人家在上海又搞了一个对象——”

这和孙天宝的调动有什么联系？我真佩服柿饼子脸的擅长发挥，提起那位上海小姐，他脸上的那种怪笑，也让我恶心。

“他没有精神病，是个有事业心的小伙子，你看，能让他干农机制造去吗？”

局长大人象一只复苏的螃蟹，胳膊腿一齐伸着，打了个哈欠说：“你这人，真是越老越糊涂了，怎么又同情起这帮子人？他们在乡下受不住了，想跑进城来，是追求物质嘛，

(我懂，他一向把“物质生活”简称为“物质”的)，迁就了这些人，就是向资产阶级让步！”

简直是胡扯！你局长大人不也住在城里吗？而且人家一个在大城市长大的青年，主动要求到乡下来工作，不是为了革命事业，倒是贪图你一个小县城里的“物质”吗？活见鬼！

话不投机，没说几句我便压不住火了，我质问他：“曹局长，你对这些知识分子哪来的那么多仇恨？他们不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吗？你这是一种什么感情？”

柿饼子脸上挂起了一层冰霜。大鼻孔里吭吭了两声，便跟我摆起局长的架子来了：“问我什么感情？无产阶级的感情呗！我倒要问你，你当局长那阵儿，你对他们是什么感情？向封、资、修叩头做揖的感情嘛！”说罢，他披上棉袄，叼着香烟，倒背着手走了，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。我气得哆哆嗦嗦直喘，还有什么好讲的？

回学校的路上，我的心还是咚咚地跳荡不已。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见之于党的许多文件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为什么曹局长这些人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去践踏它呢？哀乐声中，我又想起周总理那慈祥的面影，接着孙天宝那张泪水纵横的清瘦的脸便跳到我的脑际，他现在还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眼巴巴地等着我呢！我的回答将会怎样地再一次地打击他啊！

我在门前站了片刻，终于轻轻地推门走进屋里去。他坐在我办公桌前，两只手灵巧地用烟盒里的锡纸迭了一个小小的花环，见我进来，急忙把银色的花环摆到桌上的总理的遗

像前。

“你的手真巧。”我不愿马上谈起那件令他失望的事，拿起他做的花环，端详着。他无言地盯着我，那双眼睛啊，简直要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看穿似的。

“这回，还是没能谈成。”我被逼不过，只好照实说，不过为了避免他过分失望，特意加了“这回”两个字。

他扶扶眼镜，闭上眼睛想了一阵，然后出乎意料地笑道：“唔，明白了，你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唔，生活就是这样，生活就是这样……”

什么？生活就是这样？生活本不该是这样！这是被人搞得歪七扭八了的生活嘛！我说：“你不能这样讲，这是暂时的！”

“唔，是啊，这个，我信，我完全信，生活就是这样！”

他已经背起挎包了，向我说：“再见，不必难过，不必为我难过，我该走了。唔，还忘了谢谢你。”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，使劲抖了抖，接着说，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唔，同志。”

他踏着雪走了，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我久久地呆立在雪地上，望着他的背影，心里象喝了烈酒一般地在发烧。“同志”，他那颤抖着的声音还响在耳际。难道就让他这样走吗？天快黑了，三十多里的风雪之路，让他一步步往回挪吗？为什么不留他住一夜，等雪住了再让他走呢？我疯了似地追上去，跑啊，跑啊，雪溅了我一身一脸。铅色的天空低垂着，漫天的雪花很快地吞噬了他。我喘着，喊着：“孙天宝同志——”，喊声在雪原上回荡着，但是没有人应。他，就这样走了。

三

一个青年，抱着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生活中来，接二连三地碰到挫折，他会怎么想？我担心他经不起这样的打击，又后悔在他回去之前没能充分地跟他解释一下，几天中一直想去看看他，但是这想法终于被一次意外的调动扰乱了。

一天上午，曹局长打电话叫我。进了他的房间，出人意料，柿饼子脸上竟满是神秘的笑。

“啊，啊，恭喜你啦。”他伸出那白嫩得象女人似的手说：“一工交，二财贸，最倒霉的上文教，老兄这回跳出文教口了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调我上哪？”

“财税局。怎么样？呵呵，升了财神爷了，哈哈……”

“我不去！”我感到自己连呼吸都急促了，大声地向他申明道：“我在教育战线工作了二十年了，我熟悉教育工作，我……”

柿饼子脸上那双小眼睛一眨一眨地说：“你熟悉什么？搞修正主义你熟悉，搞无产阶级教育你也熟悉？”

他不只一次地宣判过我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了，真让人忍无可忍。我常想，当有人指出我的缺点，错误，为了使我的工作能做得更好时，即使他批评得严厉，我也是诚心诚意地感激他；而当有人抓住我的一点缺点，甚或是把我的正确的地方也当成罪恶批，目的就是为了打倒我，否定我们事业的成绩，这样的人不管他挂着多么革命的旗号，我也不买他

的账。但是，现在如果我跳起来同他摆理时，他一定会更加专横地重复他给我扣过多次的“为修教路线翻案”的罪名，眼下，这又何必呢？于是我回到工作调动的问题上说：“反正，我不去！”

他不再理睬我。用手指甲挠着稀疏的头发，埋头看《参考消息》去了，那神情分明地暗示我：已经定了，去也得也，不去也得去。

结果，我是被调到财税局集市贸易管理站任站长去了。

管理集市贸易虽然琐细却非无意义的事情，但因我是被人强令调离自己所熟悉的岗位扔到这里来的，心情自然不愉快。五天一小集，十天一大集，我照例在市场上执行自己的职责。

春天里一个无风的好天气，我在猪市上溜达。一个卖江猪的老人吸引了一大帮人。他的猪崽儿肉肉头头，活蹦乱跳，也真逗人喜爱。站着的，蹲着的，背着手品评的，以及看热闹的人，严严实实地围了一大圈。我伸着脖子往里挤，这时，一个原先蹲着的挑猪的人站起来，他的大个子立刻挡住了我的视线，这人穿着一件黑市布棉袄，浑身上下蹭了许多猪食疙瘩，我想他是哪个队上的饲养员吧！

“孙天宝！”当他扭过脸来往外走着的时候，我不由得惊叫起来。

他亲热地搂着两只小猪崽儿，一面小声地对猪崽儿说：“听话，听话，回去给你们做豆面糊糊吃，唔，听话哟。”听我喊他，他抬起头，眉尖蹙到了一起，阴云也立即笼罩了他的脸。

“你不是孙天宝同志吗？”

“唔，唔，”他的脸涨红得象一块红布，一边支支吾吾地应着。

“你怎么买猪来啦？”

“唔，唔，我调到东山公社社中了，唔，我现在当上饲养员啦，唔，这很有趣，很好，很有趣……”

我简直懵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唔，唔，我得赶回学校去，你……唔，我现在该走了……唔，唔，……”

我想拉住他，到机关好好聊一聊，但他却象怕我似的，一个劲地躲着、退着，把猪放进筐里背起，也不打招呼，转身就要走。

“慢走，急啥？你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唔，很好，很好，养猪，这很有趣。唔，我很喜欢，唔，我该走了。”

他，细高的身材，在拥挤的人流中一蹶一蹶地走了，连头都不回。

悲愤和不安同时向我袭来。党和国家花了多大代价培养了这样一个大学生，曹局长这些人却逼他去养猪，这不是糟踏人才吗？这能令人心安理得吗？但是这样的不公平我相信终归会改变的，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，虽然困难很多，前途是光明的，总有一天，乌云要被驱散，眼下最使我忧虑的是孙天宝本人，如果他心中理想的火熄灭了，如果在挫折面前屈服了，如果他丧失了前进的勇气，这倒是可悲的事情。

我一直闷闷不乐。两天后当我愤慨地向机关里一个要好